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

——2023 年度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

吕长全

2023 年 3 月 25—26 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金融研究院、《产业与科技史》编辑部共同承办的“2023 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全国 20 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相关论题展开热烈讨论。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综述

学科研究综述是推进学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利于研究者迅速掌握学科的新趋势、新发现、新进展。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 2021 年和 2022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该阶段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同富裕的实践等,研究重点则包括“三农”史、财政史、金融史、经济制度变迁、城乡关系史、工业化进程、生态环境史、对外贸易史、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等。他还展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张彦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论述了 2022 年财税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和主要观点,介绍了当代中国财税史研究的新进展。贾子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 2022 年在新时代经济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史、新中国工业史等研究领域均取得新进展。

除了概述学科研究新动态之外,部分学者对数字经济、消费金融、产权改革等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总结。林柏(山西大学)回顾了 1999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研究的状况,指出数字经济在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初始期和发展期之后,直到 2015 年才进入高速发展期。赵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对当代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金融领域中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翟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从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成效与影响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文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系统梳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和经验,是当代经济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程连升(中共中央党校)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瞿商、胡子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的三次赶考,认为其核心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复兴。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详细梳理了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建设阶段和目标的不懈探索过程。任志江(南开大学)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的理解经历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种类型,探索出了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朱高林(扬州大学)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扩大消费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简介】 吕长全,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太原,030031。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引起不少学者关注,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等。刘成虎(山西大学)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差异性、一致性以及衔接困境,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对策思路。钟瑛(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续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谭振义、段满玉(湖北师范大学)总结了十八大以来西部大开发十年的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柴毅(云南大学)阐述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和阶段特征,他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张晓玲(南京审计大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发展的百年历程,展现了党领导审计实践并推动审计思想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民经济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实践活动的深入,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也在逐步调整,比如商业政策以及汽车、煤炭、农业等行业政策。朱海城、崔巍(浙江财经大学)借鉴经济史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历史维度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商业政策的演变历程。彤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宏观背景、科学规划、配套协助、人才作用以及引进外援和自主研发等方面,综合分析了陈云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擘画。刘文斌、刘洁(山西大学)重点探讨了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为推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杨梦颖(农业农村部)立足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背后的现实条件和战略考量。李飞龙(西南大学)以1950—1957年的垦荒政策为切入点,重点讨论了新中国垦荒战略的两次重大调整,以及其与粮食增产、荒地产权、农民心态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李进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立足制度变迁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国农作物种业体系市场化的转型过程。

从更微观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体上,我们也能窥见经济管理实践中的试错和优化,如城市水资源、农村供销社等。刘青、张连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发现,上海市的水资源管理策略从以“开源”为主变为“开源”“节流”并重,有效缓解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为创新治理城市水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岳仁崇(贵州财经大学)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研究,发现供销社不仅发挥了地区间和城乡间物资交流的经济作用,还承担扶助农业生产的职能。此外,吴绮雯(北京理工大学)总结了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中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的关系。

四、财政金融史、企业史及其他

与会学者还就财政理论、信用社和边区货币等财政金融史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龚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立足于货币关系论和国家分配论,系统梳理了新中国财政理论的形成过程。宋士云(聊城大学)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转型过程,将其分为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制的初步改革时期、农村信用社规范合作制的改革探索时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全面展开与转型时期。瞿商、胡子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湖南、湖北两省信用社存款的对象、种类、利率和形式,并探讨其绩效和存在的偏差以及对这些偏差的纠正。徐德莉、蒋旭(广州大学)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治理伪造货币的“三驾马车”——税收、国债和发行货币,并认为这些政策有力维护了边币的信用安全,有效治理了边区的伪造货币。

学者们的个案研究则展现了企业在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有力变革。江轶(湖南工业大学)以湖南厂矿为例,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领导机制的嬗变——“党委制”的运行与反应、由“党委制”到“一长制”、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书记一长制”的纠正努力等。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的发展史为例,剖析了该公司对苏联的技术依附

和去依附过程,并考察了其如何通过吸收技术实现独立创新。

本次研讨会名家荟萃,少长咸集,与会学者基于个人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诸多维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从研究范围看,有微观的企业分析、中观的行业剖析、宏观的全国研究;从研究方法看,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皆有体现;从研究结论看,广大学者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新见迭出,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责任编辑:马烈)

《褪色的金饭碗——国营事业职员收入变迁(1927—1949)》简介

何家伟所著《褪色的金饭碗——国营事业职员收入变迁(1927—1929)》由中华书局2022年10月出版,并由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马敏、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吴景平为之作序推荐。本书认为,收入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能比较集中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本书主要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金融邮电事业职员的收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从国家、社会及个人三个层面进行了总结。

全书共分八章(不包括绪论、结语),约35万余字。

第一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事业人员常薪福利待遇收入。四行常薪与福利待遇的共同特点是由分散走向划一,常薪福利待遇标准的统一化,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管理,却使市场因素下降,行政化色彩被强化。

第二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邮电事业人员的常薪福利待遇问题。邮电人员的收入特点是:职位分类复杂,人员众多;收入两级分化大,邮差承担了大量体力劳动工作,体力消耗最大,经常需要肩挑人扛,待遇却一般。其弊端主要是:邮政制度规定不尽合理,严重侵犯劳动者相关权益;同样作为大学毕业生,加入电政事业,“钱途”不高,顶薪低于国营金融邮政事业,电政收入制度设计有缺陷。

第三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对不同群体收入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和邮电事业人员抗战前、抗战期间及抗战后的工资、物价、收入及生活状况的变化情况。战前,如果社会稳定,该群体生活基本优裕;一旦发生动荡,生活状况受影响较大。对比四大银行战时盈利指数,可以合理推测,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员工生活状况可能优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抗日战争后,高级行员月薪俸与战前低级行员月薪俸持平,但仍有其他收入。1947年是社会各界生活水平下降的转折点,但个别银行人员在1949年前夕有小幅回升。考虑到四行利润不同阶段的水平,四行人员生活状况在抗战前、抗战期间、抗战后存在一定区别。

第六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的限薪措施及效果、原因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金融邮电业收入较高,在通货膨胀前,各界并未有太强的感觉和认识,但到了通货膨胀严重时期,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保持的较高收入状态,让其他低收入各界渐有不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国营金融邮电业的限薪大致经历了“相安无事”、“袒护”直至“明确限制”这样一个阶段。分析限薪,需要区分抗战前绝对高薪与抗战后相对高薪。抗战后相对高薪限制效果有限;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具有市场成分,与公教人员依赖财政拨款有区别;抗战后国营金融邮政主要是银行人员,抗战前的高工薪跌落至战后低收入,已陷入“无薪可限”之境地。本书认为,限薪对象主要是各机构特权群体而非普通行职员。

第七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业人员收入体现的人事管理特点与经济思想。收入体现的人事管理特点,主要表现为重视人才选拔、注重日常管理、重视职工教育、注重(高薪)养廉等。综合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事业收入所体现的人事管理及经济思想本质特征具有二元性。人事管理、经济思想的二元性,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过渡性社会在人事管理及经济思想中的反映。

第八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的社会影响,主要从收入与城市社会分层、城市社会流动、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关系角度进行了分析。在城市社会分层中,本书尝试将城市工薪阶层划分为超高工薪、高工薪、较高工薪、较低工薪、低工薪、城市贫民及失业者,这些群体呈金字塔型。城市社会阶层流动中,既有水平流动,又有垂直流动(包含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通货膨胀前,城市工薪群体向上流动有所增加;通货膨胀严重时,国统区职业人口虽呈向上流动趋势,但经济地位却呈向下流动趋势,导致金字塔尖变细。在收入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关系中,本书认为金融健康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提高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何家伟)